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一辑

超越后殖民理论

Beyond Postcolonial Theory

[美] 小埃·圣胡安 (E. San Juan, Jr.) 著

孙亮 洪燕妮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一辑

超越后殖民理论

Beyond Postcolonial Theory

[美] 小埃·圣胡安 (E. San Juan, Jr.) 著

孙亮 洪燕妮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后殖民理论/ (美) 圣胡安著; 孙亮, 洪燕妮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4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1辑)

ISBN 978-7-300-21130-5

I. ①超… II. ①圣…②孙…③洪… III. ①后殖民主义-研究 IV. ①D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5125 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

超越后殖民理论

[美] 小埃·圣胡安 (E. San Juan, Jr.) 著

孙亮 洪燕妮 译

Chaoyue Houzhimin Li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8.75 插页 1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1 00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编委会名单

主编

庄福龄 罗国杰 靳 诺

委员 (以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陈先达 程恩富

顾海良 顾钰民 郭建宁

韩 震 郝立新 贺耀敏

侯惠勤 鲁克俭 梅荣政

秦 宣 石仲泉 吴易风

张雷声 郑杭生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致 谢



自我翻译卢卡奇英文版的著作（1973年于纽约出版）至今已有二十余载。虽然经历了冷战期间的跌宕起伏，但是伟大革命家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人。事实上，这些思想主要集中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部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我们能否将这种实践理解为一种激进的“理论实践”抑或一种统一的联盟活动？首先值得一提的以上问题或是我讲座内容的一部分，或是我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评论，又或是我基于敌手的利益以及竞争机制所带来的机遇的情境下对该问题的重思。毋庸置疑，此处的许多主题和论点是我早期研究著作的再续，其中包括“激进形式主义”、“改革、霸权和越界策略批判”、“菲律宾的诱惑”。

以上主题和论点大多为在菲律宾尤其是在奎松城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及菲律宾大学的各个学院（遍布马尼拉市、怡朗市、米亚高市和碧瑶市）和万丽市国际管理学和经济学学术中心的研究对象。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马尼拉雅典耀大学的索雷达·雷耶斯教授和露露·托雷斯教授、菲律宾大学的埃尔默博士，另外感谢国际管理学和经济学学术中心的托马斯·塔尔勒杜教授、罗兰·森布兰教授、威利格思教授和该中心主任桑托斯等人盛情邀请我到该中心讲座。

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同道，来自意大利特兰托大学的吉尔万纳博士和马克博士，感谢他们在1995年5月的特兰托英语研讨会上与该会成员分享我的想法。另外，我还要感谢达特茅斯大学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研讨会“多元文化想象”的发起人唐纳德·皮斯。本文的第二章及其他章节的很多内容的构思得益于与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的交谈。感谢在冷战期间给予我莫大帮助和支持的同事，他们是：爱兰·沃尔德（密歇根大学）、阿里夫·德里克（杜克大学）、詹姆斯·本尼特（阿肯色大学）、罗伯特·汤布洛斯基（纽约大学研究生中心）、布鲁斯·富兰克林（拉特格斯大学）、山姆·诺莫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尼尔·拉森（东北大学）、胡·德哈特（科罗拉多大学）、W. F. 豪格（柏林自由大学）、保罗·布勒（纽约大学）、唐纳德·韦斯林（加州大学）、曼宁·马拉布尔（哥伦比亚大学）、罗格·布雷斯特纳汉（密歇根州立大学）、兰西和诺曼·钱斯（康涅狄格大学）、吉姆·兹韦克（锡拉丘兹大学）。特别感谢弗吉尼亚大学凯伦·古尔德主任和州立鲍灵格林大学伦理研究会主席米歇尔·马丁教授的鼎力支持。最后，非常感谢迪莉娅·阿吉尔勒（州立鲍灵格林大学）、埃里克·圣胡安（芝加哥大学）和阿吉尔勒·圣胡安（布朗大学）等人的宝贵意见。本书的一切失误皆由本人承担。

感谢马丁出版社所有的工作人员，尤其是莫拉·E·伯内特，其在本书的编辑、出版和销售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本书某些章节已在一些刊物或丛书中发表过，其中包括《联邦文学》、《道路和目标》、《亚洲周刊》、《左派思潮》、《精灵》、《亚太研究论文集》（杜克大学）、《迪里曼评论》、《菲律宾资源中心纪事》、《论争》等，在此向以上刊物或丛书的编辑们致敬。

序 言

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一种被称为“后殖民主义”的新学科和学术产业也随之兴起^[1]，一般来说，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为彰显文化研究和人类科学等中心议题提供了契机。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制度权威应当关注知识审慎、权力监督和文化预判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同一性、内在差异的多元逻辑和与之相关的独特性、暂时性显得尤为重要；阿里夫·德里克在其《后殖民氛围》（1997）一书中，全面探究了主体与历史的问题；历史理性、价值和结构转变等话题为如今学界热衷讨论的“道德观”、“身体观”、“欲望观”所覆盖和取代。冷战后的民族国家间的联盟在权力上发生了转变，国际关注点从共产主义的整体主义、民族冲突、劳工移民和妇女贩卖等话题转移到日益兴盛的恐怖主义和人权问题上（这里仅针对时事问题），这在无形中加重了人类学课题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负担。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仍旧坚持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此一来，便加剧了新保守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转向之风越发强劲，譬如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改变了传统学科的标准和优先性，八九十年代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和生态保护运动、和平倡导运动以及女权运动形成了如今我们称为“文化战争”的用词。^[2]

随着在苏联及其周边官僚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采用掠夺性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有人开始猜测整个社会变得空荡荡，自由对一切即兴创作开放起来。在这种情形下，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反核运动团结一致，以防以邻为壑的个人主义、宗教主义和新世纪原教旨主义和反动主义，如此一来改革工作和解放议程被暂搁下来。在这个过渡期，“跨文化学”的概念开始呈现，这使得移民居住在一个变幻莫测的未来。暂时性成为一个模棱两可且“没有目标的行动”领域。根据情境主义观点，国际处

于一个没有进步的发展状态。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及其他学者从迪士尼工厂废墟和生态灾难中召唤出来的“第三空间”的概念同样显得模棱两可和杂乱无章。

在开始我们的讨论之前,我们或许应该阐明一种新的关系逻辑,即多元性逻辑下的公共边境和跨界居住等新概念。然而,剥夺人权的情况并未消失。后现代主义厌恶普遍性用词,更不用说整体化了。解构主义的“自由”领域不能容忍启蒙运动进步和解放的叙事方式。令人好奇的是,在解构主义的告诫中,拒斥本质主义以致破坏权力话语并以非对称结构取而代之的诉求并没有使得我们在后殖民考验中遭遇任何非正义的统治抑或对该统治的实际抗拒(这个论点同样适用于作为题为“离散化”与“次要化”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英国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笔下深度描写的英国窘境与贫困的南方所处的后殖民危机留给我们思索的问题在于随机的统一性和拜物教,这种统一性和拜物教似乎永远遵循着一种不确定性。后殖民主义(不管你是否承认它),对一些人来说,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向个体妥协,它为机会主义的蓬勃发展留下了余地。

在我看来,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或文学现象,这种现象只限于那些经历过殖民统治的人。殖民经历,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欧洲殖民主义促使世界划分为核心工业社会和周边欠发达的社会,同时它实现了文艺复兴与现代在人类史上的划分。然而,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据列宁称)的出现孕育着其自身的消亡。巨大的危机和灾难笼罩着我们所处的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社会:世界大战和革命,包括反革命运动(尤其是苏联等国家社会的衰退)。如后现代主义一般,后殖民主义经由南方“买办知识分子”而实现(Appiah 1992),它做出了感性的划时代的转变,过去殖民时代的知识分子反映了预期中对抗的“感觉结构”[借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修饰法]的突变。国际解放运动的失败尤其实现了现代与过去完全的决裂,过去,应验了霍布斯那句话,是“肮脏而残忍”的,然而它却并不短暂。

在评论这种认知转变之前,我想把后殖民主义置于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所概述的国际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的框架内加以讨论。这个危机以“由平均利润率的减少引发的资本积累过剩和商品生

产过剩”（1995：438）为特点。为了增加平均利润率，更精确地说是平均剩余价值率（即雇佣劳动的剥削率），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努力引入技术创新（如计算机化），并且不断创造和满足社会积累条件以适应主要以构造一个“二元社会”进一步破坏第三世界工人阶级为主的工薪一族的社会凝聚力（Figueroa 1997，参见第六章相关讨论）。这些人群包括年轻人、失业者、少数民族、移民、妇女等等。自二战之后，“后工业”社会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历史僵局仍然存在，由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长期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使得南方的危机进一步恶化。根据联合国报告，大约有 10 亿后殖民统治下的居民生活于贫困线以下；每年有 1 600 万名儿童死于饥饿和疾病——这一数字相当于整个二战时期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及孟加拉饥荒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曼德尔号召人们关注帝国主义的野蛮对环境 and 世界健康状况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其中包括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化问题”。

4
以上是我们从一个客观的立场出发所描述的社会现象，洛杉矶市区的重建表明真正后殖民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的崛起，它集中体现了全球化程度的参差不齐性。对此，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晚期的主流文化体现在城市建筑和城市景观上，迈克尔·戴维斯（Michael Davis）指出，瓦尔霍勒斯齐（Warholesque）建筑风格的转变，如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酒店和博纳旺蒂尔（Bonaventure）酒店的建筑采用了以下两种混合元素：当前寄生于资本主义危机中新国际资本循环和全新的阶级分化导致城市改革理念的破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级冲突不断加剧，种族和民族性更为浓厚：1992 年洛杉矶城市暴乱正预示了以上趋势的蔓延。

在此，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未来正化身为当前的社会情境。如今值得我思考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让跨国企业集团（鉴于自身不可通约的差异性）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它们的强强联合，这一点也正是后现代/后殖民艺术家和批判家们所致力要澄清的问题。但这些艺术家或批判家们存在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们自身没有办法弄清决定社会变迁的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不仅发生在社会边缘，同时也发生在社会中心。

洛杉矶从一个落后城区发展为一个重要的环太平洋经济金融中心（虽然其造船业处在南加州难以控制的房地产通货膨胀，但其国



防工业仍然蓬勃发展)。急剧恶化的城市基础建设及随新浪潮而来的近 100 万的亚洲、墨西哥及中美洲非法移民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后现代资本主义并非如詹姆逊所预言的最终将消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后现代资本主义却能厚颜无耻地去回忆城市开发最原始粗糙的形式。(M. Davis 1985: 110)

不仅如此，戴维斯提到在半径为几英里的后现代酒店里，至少存在 10 万名包括儿童在内来自不同国家的受超级剥削的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这般重组不仅预示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且还预示了随着由多民族城市无产阶级的超级剥削而诞生的绝对剩余价值所带来的“原始积累的复归”（这个问题我将在第四章中展开讨论）。拉丁美洲艺术家科科·富斯科 (Coco Fusco) 于 1992 年出演的《两个未被发现的美洲印第安人访问》就揭示了当今的“返祖”现象，他将这种联系定性为“晚期封建社会” (1995: 24)。这种回到“原始积累”的做法实质是在抹去了其殖民记忆的叙述中使自身得到理解。

一本以唯物史观为真理导向的文集写道：资本主义作为世界系统，其发展是不均衡的，剩余价值的积累策略决定了其“自由市场”的运行规则。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同的生产模式以短暂性和“上层建筑”效应使得整个市场实行了重新配置 (Jalee 1997; Nabudere 1977; Brewer 1980; Wallerstein 1983)。我们发现了在资本主义兴起的地区，其都市中心统治了周边领土和人民。殖民主义及随后的金融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 压缩了时间和空间，大量地将完全相异的经济与政治整合成相关联的文化，此种殖民中心支配着现代性的尺度。二战以后，随着技术交往的完善化以及交通便利化，前殖主体加速了向大都会的移民速度，从而实现了“异构”语言的统一化以及中心与边缘的日常生活行为的均质化 (Featherstone 1990)。我认为，后殖民主义既作为这种混合且多层次的文化逻辑，是晚期现代性的反映，同时也是殖民权力与被殖民权力统一化 (城市化) 的逻辑。

后殖民谱系的争论可追溯到以发展不均衡状态否定历史因果关系的做法。尽管“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也有人称之为后交往主义或后革命主义) 具有不可分割性，但是后殖民主义可追溯到帝国西部内陆地区高等学府的知识分子的逃离和移民潮的兴起。该争论以阿吉兹·阿罕默德 (Aijaz Ahmad) 对西方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第三世界”

的浪漫理想主义的质问为发端。在阿罕默德充满挑衅的《理论上》一文中，阿罕默德反对詹姆逊“国家寓言”的概念，他区分了为去殖民化运动所抵触的社会形态的书写方式与流行于“第一国际”所钟爱的物化与原子化书写方式。不管承认寓言与否，阿罕默德和詹姆逊都扩大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超验意义和目的。阿罕默德坚信这些寓言并不表明“第三世界”文化实践的多样化。此外，阿罕默德还对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提出质疑，阿罕默德尤其质疑萨义德将马克思主义从后殖民批判中清扫出去并隐晦地妥协于资本主义的一般意识形态的做法。

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阿罕默德（1995a）转向质疑由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霍米·巴巴两人提出的“后殖民文学政治”的概念。斯皮瓦克和霍米是后殖民理论的两位领军人物。阿罕默德哀悼后殖民理论否弃历史，尤其否弃人类生存和发展轨迹的历史。尤应谴责的是，这种理论呈现出的折中主义，有时甚至对资本工具化规则一知半解：“在这一语境下盲目沉醉于一体化的跨国文化、偶然的政治实际上相当于认可超越资本本身的文化主张……至今我们对如何评价电子文化一体化所带来的后殖民文化和跨国文化一概不知，我们只知道这种文化有可能造成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腐败和全球人口比例的降低以维持野蛮的生存状态，更不用提电子文化和电子部件给人带来的影响了。”（1995a：12-13）阿罕默德将这种现象与不加选择的相对主义合称为“文化差异主义”，该理论的预设建立在各种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它不为任何客观标准所证实或证伪，同时该理论还披露了与晚期资本主义共谋的后殖民政治的目标在于维护有色人种的霸权统治（Ahmad 1995b）。

后殖民学说承认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文化差异的现象的本体论优先性。这种处于内外空间的差异体之间的关联产生了一致的交互体：“在差异体重叠与置换处出现了间隙，即民族的主体间性和集体的经验、协商的社群利益或文化价值。”（Bhabha 1994b：1-2）自从资本民族实现了劳动分工和一体化之后，各种差异现象也相应产生（Wallerstein 1991）。但是，对霍米而言，后结构主义的“书写差异”涵括了各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社会科学（Memmi 1965）。在某些特定的关系结构和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体：“后殖民移民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上大迁徙的叙事、农民与原住民的社会迁徙、诗人的驱逐、大批的政治和经济难民的遣散等等”（Bhabha 1994b：5）。柯林尼克斯



(Callinicos) 把霍米的方法称为“理想主义的社会还原法”(1995: 111; see also the wide-ranging essay by Parry 1994)。不确定性、困惑性、无限变化性、转化和协商构成了后殖民文化理论和实践的特征。除了上述讨论的后殖民主义对历史参照系的模棱两可以外, 尼尔·拉森(Neil Larsen) 还指出神秘话语体系中的后殖民假说阻碍了后殖民布道者进一步下如此尴尬的结论: “作为历史产物的资本民族和资本民族主义既不是历史的起源, 也不是历史的归宿。” 由此一来, 后殖民假说要么走向古典历史学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要么选择“文化现代性阉限”(1995b: 15) 的反历史学道路。霸权集团和下属部门组织间的客观权力和资源十分不对称, 其造成的后果是大城市和“第三世界”的少数民族之民族性的消失。

在这场关于政治异质性和同一性的辩论中最突出的是主体问题, 即具体的历史情境下阐明的改革意向问题。而这些关键之处(见第一章、第三章和第五章内容) 被正统的后殖民主义忽略。正统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比尼采的无政府主义更加激进(福柯、利奥塔、德勒兹), 然而这些思想却是有问题的, 尤其对有色人种寻求社会认同和原住民传统来说。将贯穿在种族、性别和阶级政治经济上的剥削的事实还原为话语权和互文性的做法实质上是取消了主体和集体主义对生活产生的影响。超越性的差异政治为霸权批判和社会再生产和再分配的物质实践所取代。

在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加雷思·格里菲思(Gareth Griffiths) 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 的《后殖民研究读本》的笔记中, 三人声称后殖民理论否认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叙述手法, 其中涉及进步概念的发展、本质主义的主体性、目的论等等。加雷思·格里菲思等人同意后现代主义消解帝国主义中心/边缘二分的话语体系的目的, 由此一来他们就衍生出后殖民主义的政治主体这一概念。⁸ 然而, 后殖民主义的政治主体学说并不仅仅指代一种历史过程的理论, 而且还指代一种辞藻华丽的修辞游戏。对此, 最致命的一点在于后现代主义以一切基础和客观的正当性将不利于创造力的发挥并阻碍对全球发展不均衡和压迫的抵抗运动为由对其加以拒斥。一体化和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局部知识、半机械人、边陲脚本(borderland scripts) 等口号遮盖了跨国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实践泯灭人性的本质。后殖民话语体系产生于“第一世界”的学术界, 它是后福特资本主义的产物, 而不是

其对立面。

后殖民修辞学已贸然地剥夺了底层者的话语权（详见第三章），即使在说话者选择沉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将其视为前瞻性的颠覆模式。毕竟，语言立场可以作为一种斗争武器；语言恰恰由多重音节（multiaccentual）构成，这是因为说话者沉默不语意味着其内心无声音节从四面八方传来构成该种不语的状态。这种内心的共鸣构成了欲言不能的话语的呈现、抑制到脱口而出的整个迹象。蒙太奇的和谐音正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托马斯·阿列亚（Thomas Alea）令人难忘的电影《不发达的记忆》大幅采用了这种蒙太奇手法，该电影以导弹危机为尾声，电影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塞尔吉奥（Sergio）做了如下忏悔（“这个岛是个陷阱……非常昂贵的尊严”），与此相对应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哀泣：“我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如何保持正直也知道如何捍卫自己的主权。”（1990：95）以“交互性”来标榜这一时刻将可能永远错失这一刻，因为占用权势并最终将它作为一种消费业务而消除。我们使得残余的统治思潮在斗争中发生转变。同时，这种特称也不会随享乐主义消费欲的提升而完全改变或消失殆尽。权力往往随情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不会消逝于抽象空间[contrast Smith and Katz (1993) with Soja and Hooper (1993)]。另外，社会分析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空间和历史的分析（Rosaldo 1994）。简言之，危机存在于我们的工作、生活、娱乐消遣中。危机不仅把我们逼向危险和唯我论的死角，同时它也为我们与传统决裂以及未来的解放做了准备。

对比被殖民者自身的反抗，后殖民理论尤显讽刺（这点我将在第一章和第三章重点论述，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第七章中所论述的詹姆斯的思想）。显然，后现代主义是发展不均衡的表现，它经历了拜物教并从具体社会的确定因素中分离出来。后殖民理论以个体反抗为名旨在解决使即时性稳定化的问题——各种形式的“东方主义”非对称的殖民效应以及整合与调适策略和与之相对的制度和手段无关。从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视角来看，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将差异、分裂、阈限和离散视为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对象（劳伦斯只是把后殖民主义视为一种亚民族文化）。这些认同原则构成社会生产关系，尤其是与全球社会劳动者分离的再生产关系的固定模式。后殖民主义批判家们不仅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语境，而且还将这些语境看成是从后现代社

会的文化生产结构和政治合法性中分离出来的自主现象。勒费布尔 (Henri Lefebvre) 阐明：“每一真实‘时刻’（如视域融合或种族隔离）一旦被孤立起来或使之实体化，那么它将成为其他时刻的否定并进一步否定自身。一旦内容受限并转化为形式，那么它将压制或解构自身的真实性。”（1968：167）

后殖民主义因否定的神秘主义和道德主义而受到谴责。最终，后殖民主义致力于实现暂时性实践、风格、思想形式和表现的具体化以解决跨国资本主义危机引起的特定历史矛盾。殖民主义的阐释方式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差异，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方式可用于阐明殖民主义。不均衡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范畴，而是经验性的单向度描述，这种描述为主体自由留下余地。卢卡奇声称的“道德乌托邦主义”陷入了主观主义，这一观点困扰着后殖民主义，这是因为该观点忽略了决定主体自由和道德的内在构成要素的复杂性。以上实现交互性、主体间性和临界性与多元决定的社会整体形式的结合往往被视为一种“本质主义”或“整体主义”而遭到拒斥。

10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将后殖民理论理解为打着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旗号，实际上通过否定自身世俗的利益和谱系来实现反革命宗旨，即通过精神和语言的概念框架否定了历史确定性以证实市场交换的正当性。后殖民理论将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为固定的规范和自然。虽然后殖民主义也谴责权力和商业主义并主张社群娱乐，但是其理论却走向了极左的反动目标：机会主义者的冒险主义。正统后殖民主义偏向于少数民族和边缘文化的临界分化和暂时性，这种党派性与工具式的性别自由和往昔的主体阶层的划分（如有色人种的划分）之整体性规划有关。如今，在较为宽容的程序多元主义的庇护下，“内在的外在”、“整体的部分”的辩证意识修正了以往的整体性规划。实际上，当前每个人参与到决策程序也就意味着市场的整体性得以重置。一旦离开作为部分到整体的辩证的中介，历史的唯物主义有必要进一步理清特定历史矛盾的变化和扬弃，正统的后殖民主义解决了历史载体的问题，同时也陷入它所极力避免的困境，即超越唯心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的自相矛盾。

在后冷战的历史环境中（意识形态在 50 年代便自行消解），后殖民模式在大城市特定的地理政治上得以繁荣。在盲目的统一化和标准化的影响下，民主共识要求竞争幻象和各种各样的信念作为补充。如果说

劳动使人发生异化，那么我们需要树立一种创造力以克服一时之快。各种品牌混杂无章，交互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充斥着整个消费市场，莱斯利·斯科莱尔（Leslie Sklair）所提及的“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意指“跨国公司竭力控制全球资本和物质资料，跨国的资产阶级努力控制全球权力，跨国主体和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机制旨在控制思想领域”（1991：82）。在这样的消费社会的官僚积累和大众化的背景中，我们应该审慎地评估后殖民主义散漫的实践（这其中包括我将在第六章勘定的新保守派的护教学）。

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可以将后殖民主义理解为对呼吁“自由竞争”市场的自由个人主义的重新清理。后殖民主义复活了古老的附属力并为商品拜物教和其他致幻的升华品所取代。然而，这种嬉戏的交换是不平等的，因为它将拉大贫富差距，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的”工业国之间的隔阂，不管人们将双方共赢形容得多么诱人，最终它还是被狡猾老练的外交手段、被或明或暗的暴力手段所支配。经过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的精密分析，后殖民主义所高度称赞的多样性和自由化只不过是“文化帝国主义”或“第三世界美国化的文化”的一部分，是整体文化中反常的官僚子文化而已。被驱逐出境的肯尼亚小说家恩古吉·瓦·琼（Ngugi Wa Thiong）以道德信念宣称：“西方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确定了其在后殖民时期的政治实践地位。”（1993：90）

11

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城市背景来讨论后殖民虚假抗性（pseudoresistance）。近来美国在中美洲、中东、非洲、波斯尼亚和其他内陆等地区（墨西哥和扎伊尔是下一步的目标）采取的干预手段确定了霍布斯原则（自由贸易的权力政治）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正如很多研究结果所示，一个国家采用何种外交政策取决于该民众在国家管理和纪律机制中的媾和（G. William Domhoff 1969；Gilbert and Joris 1981；Parenti 1995）。如今，我们有必要重提文化战争变迁中的多元化、全球化、单一民族国家衰落化、社群离散化以及市民社会修辞化等趋势（我们将在第四、五、六章中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当前美国阶级和种族冲突的尖锐化已经激活了一种多民族的霸权策略，即传统的个体主义和“美国优越主义”。然而，民族的一同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受到物质不平等和等级分化的管理共识的影响。资本逻



辑在文化差异作用下的阶级关系再生产和行业再分工不可能形成公民身份共识或者公共文化。面对经济危机、人口变迁和反种族运动，美国资本主义通过有差异文化的意识形态重构了种族歧视，这使得“激进的特殊主义”显得多少有些悬疑。该策略关注种族、移民（这里代指“非法入境的外国人”），美国资本主义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在全球范围内干预其他国家。

12 我们可以把文化多元主义（我一般把它称为“多元文化的虚构性”，这一点将在第四章展开详细论述）看作后冷战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战略性原则。从60年代开始的合法化危机现在被旧式民族实践的文明化抵消，该实践与灵活且分散的阶级形式和阶级活动相关（正如戴维斯所提及的；see Appelbaum 1996）。然而，随着矛盾的尖锐化，民族国家和民族企业试图将实践意识领域、主体和社会空间实践还原为具体化的市场空间（Lefebvre 1991）。在此引入关于标准修订的讨论是为了方便接下来在同一性政治学的领域内认识差异性：曼楚（Menchu）和西尔科（Silko）的微小叙事与圣书的宏大叙事的差异、非洲中心主义同欧洲中心主义的差异，诸如此类。

在此，发展不均衡通过一种文本异质性和有差异的叙事模式彰显出来。如果我们重新将伦理问题置于“书籍战场”[书籍被认为是竞争所谓的匮乏资源的集合体的象征（Bourdieu 1993）]，那么哲学问题的底线就更为明确了。这其中包括哲学对本质主义解构策略的失败反而为后现代主义同一性政治学提供了保障。许多教科书就如何将文化多样性转化为统一的大纲和工作指导方针例证了这些改革措施。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争辩道，传统主义者和文化多元论者都“无法将文化政治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与社会正义和公平联系起来。同时他们也无法解决以下困境：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阐明并民主地协调文化差异”（1996：207）。我承认，这是个巨大的理论挑战。我们不妨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如何协调曼楚的解释同柏拉图、莎士比亚、T. S. 艾略特和其他权威思想家在文化差异上的文本关系？如何协调基切人（Quiche）拒绝承认人同自然统一的实证观与个体同社会相分离的世界观？并从这两种极端的世界观切换为一种以独占性和排他性的个体主义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政治？

我们必须把反后殖民主义语境的单一性问题视为一个优先解答的问